

在行动中形成共有意义：社会化媒体对公益行动的影响

刘运来

摘要：社会化媒体的持续发展开启了全民公益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关注或参与公益活动。通过对“免费午餐”、“老兵回家”等典型公益项目的观察发现，在公益行动中社会化媒体不仅在社会动员和凝聚共识方面作用日益凸显，而且促进了公益行动中行动者主体性的生成。公益实践活动中多元的行动主体通过行动关联和共同参与，逐渐形成了具有规范性和秩序性的共有意义。这种共有意义是公益行动行为主体展开行动的合法性依据，也是促进我国公益实践和改革创新的社会动力。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公益行动；社会行动；共有意义

作者简介：刘运来，男，助教，新闻学硕士。（周口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媒学院，河南 周口，466001）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4) 03-0054-05

自2012年以来，中国公益实践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网络微公益的发展以及公益慈善组织的日益完善。热心公益慈善的人们通过网络结成联盟，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倡导，不断去推进公益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行动主体的个人、组织以及国家都在为建立公平、正义、公正、和谐的社会而积极行动。邓飞在其著作《柔软改变中国》中写道，我展现乡村儿童饥饿，并着手行动，却无意中发现了另外一种巨大的力量——柔软的力量，激活了无数人的爱和良善。^[1]在社会化媒体发展的今天，观察和研究这种“柔软的力量”必须基于这个平台与基础。正是社会化媒体的持续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带着各种资源投入到社会公益活动当中，在社会各方的努力下汇聚成了一条大河。作为新媒体，社会化媒体给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了表达与行动的空间。由于其自身特性，这一空间为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提供了可能。

一、公益行动中行动者主体性的生成与确立

在社会学中对于人的主体性，可以理解为人作为社会生活实践的主体，其行动过程体现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概括地说，人的主体性突出体现为自觉能动性，能够使自我内在的主观意识活动与外在的客观实践过程能动地形成联结、过渡和转化，以及预设性的意义赋予，即对自我和他人的行动动机、意图和意义给予解释，并对行动的目标、方式、环节等预先进行制定和设计。在社会学中，人的主体性意味着，人是对自己的实践过程具有主导能力的行动者。^[2]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政治现代化以及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在二者的优先选择上，学者何道峰认为中华民族面临的公共选择是搞社会现代化改革优于政治现代化改革。^[3]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国内学者的认可。相对于政治现代化的改革来说，社会现代化改革方面的基础要成熟很多。在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检视这种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一个社会个人的自由、平等，社会和谐与正义的实现程度。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自我权益、自主行动、选择参与等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

和价值的趋向。但是这一过程的实现，不会自动的到来，它需要处于这个社会中的人们不断去实践来赢得。所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其社会转型与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体的行动。社会转型作为现代性总体历史进程的具体化和本土化的展开形式，它在自身的基本方面体现出了现代性的指向过程：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主体化”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自我主体性在不断地生成和获得。社会化媒体的开放性，给了很多网民展现自我的机会，每个个体在展现个性与魅力的同时也在强调着自我价值的实现。个体在利用社会化媒体展现自我的同时，可以自由地支配和表达自己，也可以自由地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当中。这也是社会转型期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重要表征。

公益慈善的转型与发展是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而公益活动中行动者的主体性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获得的。相对于其他社会行动主体因地位、出身、权利等社会身份的先天优势而表现出来的具有先赋性特征的主体性而言，基于社会化媒体空间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中的行动者的主体性大多是在公益实践中获得的，具有获得性特征。之所以呈现这种特征，其中重要原因是社会化媒体为这些公益行动者赋权的结果。社会化媒体作为新媒体的主要表现形式，赋予了参与其中的个体和组织一种自我解放不断增加自主性和独立性的能量。在自媒体公益中，实践主体的个人自我能动性、自我权益以及对于公益理念的认同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每个个体和组织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认同，主动地参与到某一项社会公益活动当中，可以自由地选择某一种适合自己奉献爱心传递正能量方式。正如邓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他自身在公益方面的成就归功于民间公益的主体性。民间公益只有不断地稳固自身的主体地位，才能与政府实现更好的合作，这才是所谓的双赢。^[4]

二、公益主体在行动中形成新的共有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公益慈善事业一直是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民间公益慈善相对很薄弱。以政府为主导的慈善事业在遭遇郭美美和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事件后，其管理、组织制度、财务状况等系列问题备受社会质疑。另一方面，中国人传统的慈善观念遵循的是“亲亲”文化传统，奉行典型的由内到外的圆心定律。因此，我国传统的社会慈善原则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但是社会化媒体出现以后，不仅公益行动者的主体性地位在发生变化，而且社会公益慈善理念在逐渐转变。造成这种变动的因素，一方面是由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公益慈善管理自身的弊病，另一方面也是公益慈善行动本身为了适应社会化媒体时代的需要而作出的自我调整。

（一）传统慈善组织的主体性缺失

2011年郭美美炫富事件和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事件，让传统慈善组织的诸多问题暴露于公众的视野当中。一方面人们对于慈善组织利益私人化表达了极大的愤懑和不满，另一方面有对这些慈善组织的不信任而引发了社会对传统社会慈善的冷漠和排斥。这种社会情绪的变化，在公众面对传统慈善组织的募捐行动中得以体现。在2013年4月份的雅安地震期间，据《重庆晨报》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称，红十字会在灾区募捐，捐款箱内仅10元5角。^[5]无独有偶，也有新闻报道称深圳红十字会为雅安地震筹款，市民见捐款箱绕行。^[6]

这是公众对于红十字会不信任的体现。深究其中原因会发现，这正是在社会转型期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传统慈善组织的主体性缺失。在社会向现代化发展当中，每一个具有主体性的行动者都是拥有行动自主权并为自己行动承担责任的自然人。每一个主体都具有自觉能动性，都能够自由、平等地进行主观意识创造性的活动。红十字会和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的问题就是他们自我定位和行为不当，导致其公益性和公共性的缺失。对于这些公益慈善组织如何进行“主体性培育”，从而一方面来完善他们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使得他们重拾自我找到自己的定位，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这正是我国公益慈善

事业变革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公益行动中新的共有意义的形成

类似郭美美事件给传统慈善组织和慈善理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社会公益慈善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但是，真正对社会公益慈善行动带来变化的是国内包括微博、微信在内的各种社会化媒体的持续发展与普及应用。

社会化媒体作为新媒体的具体类型，同样具有赋权的可能性。其一，它提供了一种倡导动员社会关注公益的平台；其二，它是一种理念和行动的工具。^{[31][14]}新媒体赋权给每个人提供了空间，人们在利用社会化媒体交往、获取信息、表达、参与行动中，开始实现转变。其一，公益理念在发生改变。人们在传承传统慈善文化的同时，伴随着新媒体的应用，西方社会的公益理念和实践方式开始被人们采纳。其二，基于社会化媒体的网络生活当中，人们对于参与公益的行动取向更加偏向于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认同。

社会化媒体在公益主体行动中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并不等于说网络中的多元主体都能主动地、天然地形成一致的合力。因为主体的行动方式是多样的、价值是多元的，如何能够在公益行动中形成行动关联和共同参与的规范体系是首先要关注的问题。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动员力量和公益慈善理念的传播，行动者行动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在公益行动中，每一个主体都是一个“意义的主体”，从而使得主体的行动都是一个“意义的行动”。这种行动意义，在一开始参与公益慈善行动时就被行动者预设了。从对包括免费午餐、大爱清尘、女童保护等大型公益项目的深入观察发现，这些公益项目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捐助，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参与公益行动的主体之间形成了共有的意义。这种共有意义是公益行动主体采取共识性行动的基础，也是公益项目发起个人或组织约束规范自我的内在动力。

传统慈善组织的系列问题的出现，动摇了原有的社会慈善规则和秩序赖以存在的基础即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行动共有意义。正是因为这样，人们才对已有的行动共有意义质疑、否定或修改。社会化媒体公益行动，经过网民的表达与参与，逐渐确立了一种新的共有意义。那就是人人公益，快乐公益，公益不计大小多少；透明公益、开放公益，自愿公益；以微薄之力让世界更美好，用行动改变中国……正是这种普遍的、共有的行动意义，为公益活动的发展提供了一套行业、组织共同遵守的规范、秩序以及合法性依据。较之于传统公益慈善以政府为主导，甚至是一些机关单位将公益活动 and 慈善募捐作为一项工作任务来强制完成而言，社会化媒体公益行动所形成的新的共有意义则是有益于社会公益发展的，甚至会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对传统公益慈善产生重要影响。

（三）推进社会共同善的形成

在西方政治哲学中，社群主义认为，善优先于权利，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麦金太尔指出，善是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人作为一个种类所追求的目标是过幸福的生活，而善所表达的就是人的全部生活中最好的生活。然而，要能够过最好的生活或实现善，必须靠人的共同努力，遵循一定的实践价值观。这种实践价值观就是德性。德性存在的基础是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人类共同体。社群主义学者认为，在一个共同体或社群内，人们对共同利益或共同善的追求，为德性的实践提供了基本的社会背景条件；同时，也为人们理解德性作为他们共生共存的社会生活的意义提供了内在根据，并将共同善作为它实践的主要内容来看待。

社会化媒体时代，通过社会成员的行动所培育起来的公益慈善环境，以及在这场持久的行动中达成的共有意义为社会共同善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在社会化媒体公益中，微博公益可以被看作是最具有人气和最具有生命力的一种。就网民自身来讲，他的角色已经发生改变，不仅需要具备诸如正义、诚实、正直这样社会期待的道德规范，其行为方式还需得到仁慈、善良等这样的内在德性的支持。网民

参与网络慈善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帮助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摆脱困境。^[7]社会化媒体公益行为成为了公益行动者的“道德竞赛”，每一个捐助者当发现自己的钱或物正在改变他人的命运时，那种来自内心的成就和愉悦会通过社会化媒体传播开来，鼓励和吸引更多投入人投入到公益行动当中。

韦伯把具体的行动复合体当作具有意义的体系，而且将行动者的行动取向的根据分为三个方面。其中一个就是利益取向。这种取向是指行动者们为了相似的预期而作出的目的合理性的取向，进而来理解他们自身行动的一致性。社会化媒体公益中行动者们所追求的利益，不是个人私利而是他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乃至是对于社会共同善的追求。这一点既是他们的行动目标也是他们精神层面的良善品质。

具体到微公益而言，我们以2014年1月21日10点40分访问的搜狐微公益为例。在搜狐微公益“最热微公益”排行榜上的5个项目分别为：请农民工吃顿饭、衣旧暖心，给孩子送双运动鞋，让爱永恒，悼念百度第二司机，为贫困儿童募集学习包。这几个项目的支持人次分别为：75036、9256、7024、3392、935。这些公益项目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其一，项目的发起并不是为个人谋利，而是对于某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其二，参与人数广泛，呈现出集体行动的趋势；第三，公益项目不再是传统慈善时期的为灾害募捐等大的事件，转而关注日常生活中细小的方方面面；第四，通过社会精英或组织的推动，使得这些公益项目公共化，成为社会集体关切的话题。

正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力量的驱动，以微公益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公益使得社会关注公共利益成为可能。每一个公益行动个体在自主的实践中，将善作为行动的预设意义。并由此追求一种实践价值观，从而在参与集体的行动中从集体获得个人行动的目的和价值，并在参与共同的行动的过程中形成心理上的共生共存感。

三、公益行动的自否与革新

学者杨敏认为现代化的社会具有一种强烈的自否性和创新性。这种趋向不仅仅是现代性对自身过程的反对，它还是一种个人和社会的涅槃再生经历，是通过自我破坏来不断获得新生和创造。在当代，自否性与创新性得到了更为鲜明的个人和社会的行动表达。^[8]个体在个人的行动方面，会根据处境的变化调整预设的行动意义，对自我行动能力进行检视、对自我行动方式进行积极的否定和修正。这种否定与修正对于行动者来说至关重要，它是行动者内省式思考能力的体现。这种内省，有利于行动者把自我在实践中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调和。社会化媒体时代，这种自否与创新在公益行动中也有明显体现。

（一）公益募捐中众筹方式的改进

很多社会化媒体公益项目传统慈善组织不同，他们既没有庞大的人力和物力来发动全社会募捐，也缺乏利用特权和资源交换企业大额捐助资本。所以，面对这种情况，以邓飞、王克勤、孙春龙等为代表的公益项目发起人，都试图一方面利用做记者时期的人脉资源，另一方面就是发动网友来参与，积少成多。

公益行动者还在尝试通过其他渠道来获取更多的社会资金以便更好地开展公益活动。2012年，一种新的募集资金方式——众筹开始在网络上普遍出现。诸如大家投、中国梦网、众筹网等众多众筹网站开始运营一些公益项目。但是经过近两年的发展，这些众筹网平台上的公益运营情况都不理想，不少项目都被搁浅。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虽然早期作为新鲜事物有不少网友通过这些平台参与进来，但是后续发展中流量相对在减少，很多项目成功率连一半都不到。面对这种情况，社会化媒体上的公益项目开始吸取这些教训，开始尝试以新的方式来改进众筹捐助方式。如孙春龙发起的“老兵回家”项目是国内几大公益项目中使用众筹方式比较频繁的一家。关爱老兵公益基金于2014年2月18日在新浪微博平台发起了一项名为“为河南186名抗战老兵募集春季致敬礼金”的公益活动。其中一项募捐形式就

是通过淘宝平台进入“关爱老兵公益店”，在店里认购“河南·致敬老兵春季爱心卡”。此项活动共发放爱心卡558份，每份300元。所有被微博网友认购的爱心卡，都会通过关爱老兵基金会的志愿者发到老兵手中。在这个过程中认购者会收到志愿者的短信、邮件等反馈，并且可以查询捐助明细。截止2014年2月28日该爱心卡已被认购328份。

（二）公益组织资源的整合

据相关统计，截止2014年1月份，新浪微博公益平台有8700个项目在运转。这些项目虽然涉及方面广，参与群体分散，但是很多项目依然存在内容雷同人力不足等情况。如何规范、整合这些资源，这是很多公益慈善行动者们在思考的问题。

对于邓飞来说，他一直反思着自己的公益事业。一方面他要摆脱这个团队对于自己的依赖，这样这个组织才能长久运转下去；另一方面，在未来几年邓飞要着手将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大病医保等儿童公益项目整合在一起，组建一个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并建立一个类似天涯社区的网络社区，然后召集更多的有关儿童组织加入进来。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资源整合推进中国公益项目的产业化和集群化。

四、结 语

社会化媒体在中国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微博，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看做是一种社交工具。在公益慈善的发展方面，社会化媒体既作为平台搭建和培育社会的慈善意识，自身也积极投身于公益慈善，不断整合各方力量推进当前慈善事业的改革、政策法规的制定以及公益慈善NGO组织的成熟。

新浪CEO曹国伟在第四届中国慈善年会上指出，微公益能获取老百姓的赞许，能够深入人心的原因是因为接地气。微公益，是民间公益力量的体现，微公益代表中国公益回归民间。社会化媒体时代，人人公益成为可能，每个人都是公益的行动者。但是，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赖民间和普通个体，在这场社会行动中国家不能缺席。要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协同合作，在有关慈善的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作出合理创新，才能积极引导社会各阶层涌动的柔软力量，才能把公众的偏好引向共同善，让社会和谐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 [1] 邓飞：柔软改变中国：揭示当下中国各阶层涌动的社会变革热潮 [M] .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142.
- [2] 郑杭生，杨敏：个人的当代形貌：社会化理论的世纪挑战 [J] . 河北学刊，2006（5）：73-82.
- [3] 师曾志，金锦萍：新介赋权：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演进 [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序言.
- [4] 寇竹卿：邓飞的成就归于民间公益的主体性 [N] . 南方都市报-公益周刊，2013-10-21（AA25）.
- [5] @重庆晨报：红会在灾区募捐，捐款箱内仅10元5毛 [EB/OL] . <http://weibo.com/1420157965/zkNd8dTr>，访问于2014年1月20日.
- [6] 合肥热线：深圳红十字会为雅安地震筹款，市民见捐款箱绕行 [EB/OL] . <http://news.hefei.cc/2013/0422/021655178.shtml>，访问于2014年1月20日.
- [7] 人民网：“免费午餐”能否成为慈善样板？ [EB/OL] .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062/15167469.html>，访问于2014年1月20日.
- [8] 杨敏：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社会加速转型期现代性特征研究 [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3.